

猫庄消失了吗？

——《巫师简史》的乌托邦难题

卓 今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 文学研究所,湖南 长沙 410003)

[摘 要]于怀岸小说《巫师简史》,展示了湘西偏僻山寨猫庄乌托邦制度的结构性困境,即乌托邦式的猫庄尽管很大程度上做到了公平,其制度甚至类似于社会主义制度,但内部矛盾重重,最后土崩瓦解。小说由此发问:动荡时代中,猫庄人对生命的保全是否可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发生激烈碰撞和撕裂情况下,猫庄人把握世界的方式如何重建;价值观、生命观都在改变的全球化背景下,新的猫庄如何呈现。

[关键词]《巫师简史》;乌托邦;湘西;巫师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17X(2017)05-0008-06

Has the Cat Village Disappeared?

On the Utopian Difficulties of *A Brief History of the Wizard*

ZHUO Jin

(Institute of Literary Studies, Hunan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Changsha 410003, China)

Abstract: Yu Huaian's novel *A Brief History of the Wizard* demonstrates the structural dilemma of the utopian system in the Cat Village, a remote village in West Hunan. Although the utopian Cat Village has done fair largely, even similar to the socialist system, it finally fell apart for the internal contradictions. The novel puts forward several potential problems. One is the paradox between the turbulent times and Cat Villagers' preservation of life. Second, in the event of fierce collisions and tears between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the modernization, how can the people of the Cat Village rebuild the way of grasping the world. At last, how can the new Cat Village presents itself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where the values and life view are all changing.

Key words: *A Brief History of the Wizard* ; utopia; West Hunan; wizard

资本造就了产品的同质化,同时也造就了人的风格同质化;一个阶层一个类型的人,成片成群地显现出同等的品质,就连纯粹个体劳动的作家也在思维模式、语言、作派上趋同化。于怀岸是少有的例外。他蜗居湘西永顺,湘西人的独特的世界观和审美观,还没有被现代社会完全稀释,身上还保留了由神秘文化熏养而成的灵动和醇朴。于怀岸把这种独特性巧妙地灌注在自己的作品里。在当下

这种写作环境中,他的优势很明显,因为他有基层生活打底,接地气,有素材,有生动活泼的群众语言;同时他已经是一个成熟的小说家,知道小说该怎么写。作为“文学湘军五少将”之一,他过去写过很多优秀作品,但他不满足,一直在探索,《巫师简史》也是他探索的成果。他过去的很多中短篇主要写现实的湘西,乡土题材、打工题材都有涉及。作为湘西作家,于怀岸意识到波诡云谲的湘西近代史

值得从整体上进行书写。他决定把巫师史和近现代湘西史结合起来写,这种写法,对作家来说是个挑战,是需要魄力的。这部题为《巫师简史》的小说,于怀岸选了一个巧妙的角度,从湘西地区神秘文化的主角——巫师切入,描写了半个多世纪以来湘西地区一个古老村庄——猫庄的发展史或者说毁灭史。看得出来,无论是作品的结构、视角还是人物塑造,他都是花了大量心思的。

一 乌托邦结构下的生命观

把《巫师简史》定义为历史小说、家族小说,应该是有问题的。历史小说、家族小说通常有几个问题绕不开:首先是历史观问题,它体现作家的主体性和倾向性。可以选择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这种进步的历史观,也可以选择虚无主义历史观、进化史观、自然历史观、乌托邦和反乌托邦等等。其次是艺术空间,即这类小说应该以历史上真实发生过的人和事为基本素材,在熟悉历史的前提下进行材料选择和人物安排。第三个是方法和视角,其如何应用,作家的常识和素养起决定作用。在进步的历史观导引下,作家一般习惯以启蒙心态和民间立场进入作品。也有一些作家受后现代主义和解构主义影响,信奉历史虚无主义,怀疑理性认知,反英雄,反革命史,强调历史偶然性和个人感受。

在《巫师简史》中,猫庄的巫师史与湘西的近现代史是重合的。没有一个脱离湘西社会环境的巫师史,也没有离开了巫师的湘西近现代史。湘西文化是多神主义文化,虽然经历过不同文化的启蒙,但这种文化一直强悍地保存了下来。巫师并不服务于某一个神。湘西是多民族地区,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神灵,私家神、公共神,还有鬼魅、精灵,众多神灵都靠巫师来沟通。猫庄的族长制与世界大多数族长制相同,是以血缘为纽带的利益共同体。农业社会的族长制融合了血缘政治、地缘政治。“缺乏变动的文化里,长幼之间发生了社会的差次,年长的对年幼的具有强制权力。这是血缘社会的基础。”^{[1]65}同时,人口繁殖会给土地带来巨大的压力,成熟的农业技术也是血缘政治得以延续的基本前提。“精耕受着土地报酬递减率的限制,带着这个社会族群分裂,分出的部分到另外别的地方去找耕地。”^{[1]67}猫庄这个原始状态的社区形式恰好处于血缘和地缘的合一状态。猫庄整体上就是赵家家族的聚集地,但同时也开始有费孝通先生所说的中国

乡村常见的“新客”“外村人”“客边”“寄籍”居住。彭武平、彭武芬兄妹,哑巴岩匠等外人的加入,动荡年月人口的频繁流动,使得猫庄政治已经不是纯粹的血缘政治,但总的来说,猫庄所有成员共享一种价值、历史、文化和语言,有一种高度的体制认同性。

赵天国既是巫师又是族长,他身上某种程度上还带有“政教合一”的政治色彩。两种不同身份角色使得他管理猫庄的方法有所不同,但目标却是惊人的一致,那就是保一方平安、攘灾祈福、确保子孙繁衍。赵天国父亲赵久明对这种制度有过潜心的探索,他认为:“巫师和族长两种职责并不相悖,反而高度统一。作为一个巫师,一个天神的使者,他的任务是驱魔、镇妖、除邪、解秽,保山寨人人平安,六畜兴旺;族长的职责则是让种族兴旺,子孙繁衍,山寨强大,不受外族侮辱;反之,种族兴旺强大也一定会带来山寨平安、六畜兴旺、妖魔鬼怪退避三舍。”^{[2]5}赵天国是一位道德高尚、有担当的族长,符合儒家“贤君英主”的标准。他励精图治,继业守成,试图开创治世,但他的理想与那个时代是完全冲突的。他接手的是一个烂摊子,他想利用另一个身份的特殊能力——巫师的神力改变现实,却仍然难以挽回这“社稷飘零”的局面。近代史上的猫庄并不是“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全封闭社会,它也有与时俱进的一面。为了提升本族的竞争能力,赵天国也不得不进行了一些改革。比如,他很重视文教和武治,不断改良武器(改进弓箭、购买火銃),督促村民练武强身,提升作战能力。每当猫庄面临重大历史选择或者遭遇重大事件时,都会收到神谕。神谕是某位祖先通过在世的活人说出来,“只能意会”,并且用的是“发音极其深奥古怪”的已经消亡几百年的赵氏家族的土话。语言符号是巫师与神沟通的核心机密,它是横在巫师与普通民众之间的屏障和壁垒,掌握这个核心机密只有一个渠道——世袭。

赵天国六七岁才开始说话,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他发出一串当地人从未听到过又似曾相识的音节——“你敢弄死我的鸭儿,我就弄死你”;他说出“它们都是性命,性命没了谁能赔”的超前理念。在族群械斗、战争、匪患、疾病等各种威胁面前,超前的生命观既是猫庄的制胜法宝,同时也是制衡猫庄的软肋。猫庄与白水寨是死对头,白水寨的龙大榜请巫术高明的巫师施了邪法,朝赵久明射了一支

正中胸口的毒箭。起初,没有人知道毒箭是从哪里射来的,它跨越了传统射程的空间概念,把神秘的意念附加在箭这个实体上。它实际上是意念杀人低阶模式,同时又有现代军事上洲际导弹的影子。年轻的赵天国对这种双重的“高技术”一时不知道如何应对。他是一个极其重视生命的巫师兼族长,他的这种生命观灌注于他生命的全部历程。他上任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造石头房子。盛产木材的湘西,几乎看不到用石头建造的房屋,因为石头建造的房子不仅成本高,而且不宜居住;但为了阻挡这有形和无形的毒箭,赵天国认为这样做是有必要的。事实也证明,在后来各种真枪实弹的对抗中,石头房子和石头砌的寨墙是最好的防守堡垒。赵天国要求“猫庄各家各户不准造木房,一律去乌古湖开采条石或去那支溪河背大卵石”。此语一出,整个猫庄的人都炸锅了,因为人们连见都没见到过石头房子。为对付时不时前来掠劫的龙大榜,族长的弟弟赵天武拿着《演武手册》组织村民操练,要求他们学会使用新式武器火銃。不幸的是,赵天武在一次龙大榜的偷袭中失去了年轻的生命。

尊重生命、追求平等是赵天国治理族群的大前提。岩匠周正龙和他哑巴弟弟周正虎长年在猫庄建石头房子,但赵家老三赵天文按照城里学来的规矩,把周家两兄弟当下人看。他认为主子就是主子,奴仆就是奴仆。赵天国对此严厉地制止,他说:“我们猫庄从没招过长工,你是第一家,待好人家两兄弟。这两人都是忠厚本分之人,别搞主子奴仆那么多规矩,让人家心里不舒服,猫庄人听起来也不是个味道。”^{[2]99}在赵天国看来,你坏了这个规矩,以后族人打短工不也成了奴仆?猫庄从来只有辈分大小,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但猫庄的这种平等观也有局限性,落实到婚姻问题上时,就无法体现真正的平等。彭长梅出嫁时被土匪龙大榜强奸,怀上龙凤胎,生下彭武平和彭武芬。在长沙讲武堂学习的丈夫彭学清发现真相后休掉了赵长梅,猫庄人也只能忍气吞声,让他们母子三人寄身赵家祠堂。在教育问题上,猫庄没有表现出性别上的歧视,但大环境的不平等他们改变不了,科举取士制度下的旧式教育模式也影响和辐射到猫庄。天资聪颖的彭武芬因为性别原因没有了往前发展的可能,她只念了两年书就变成家里的半个劳动力,她不可能像赵长林那样进县城上学,最后出国留洋。赵天国与表弟彭学清在生命观上是截然不同的。彭学清在他爹

坟前杀土匪,邀请赵天国前去观摩。赵天国呛他一句:“我是巫师,心里头住的是神,不象你们军人,心里头住的是魔鬼。”彭学清用剥皮、凌迟的手段对待俘虏,性格极其残忍。赵天国还把前去杀人现场看热闹的赵长春和彭武平狠狠打了一顿,担心他们胆子大、心肠硬,将来要当土匪。

二 猫庄制度的结构性困境

作者在这部作品里设置了一个高度:生命的价值高于一切。乌托邦式的猫庄在很大程度上是做到了公平公正的,其一系列制度甚至类似于社会主义制度。共产党到达这个村庄时,竟出现前所未有的尴尬——这里没有土豪劣绅,不需要土地改革,因为家家都是生产资料的拥有者。但与此同时,封建宗法制度的所有不平等在这里又都存在——私刑泛滥、性别压迫、贩毒、贿赂、藐视公权、以强凌弱等,神权、父权、族权笼罩在每一个人头上,村民也是在这种高压权力结构下获得所谓的尊严的。赵天国的生命观只是停留在“活命”或者“苟活”这个最低层次上,要想跳出来达到更高层次显然是不可能的。现代、后现代的生命观,装不进古代宗法神权的套子里,小说也因此容易陷入两难境地。作者极力想证明赵天国搞的不是封建家长的一言堂,但事实上赵天国作为宗族长老,正是利用礼教仪式从精神上来控制家族成员和家族的生产生活资料的。从县城回来的赵天文带回来的“新文明”,在这里不具有任何启蒙意义,反而流出资本主义的嗜血本性。如果说古朴宁静的乡村是令人向往的,革命和暴力是被否定的,那么猫庄现有的制度值得维护吗?作为历史小说和家族小说,正视历史是其基本前提。作者实际上通过赵长梅与彭武芬两代人的悲惨命运,对猫庄的旧制度进行了质疑。赵长梅与彭武芬作为猫庄人,不能享有生产资料所有权、财产分配权、受教育权、婚姻自主权,她们的命运任人摆布。赵长梅新婚当天被土匪强奸,怀上龙凤胎,投水自尽,死于礼教;彭武芬自小天赋过人,“班昭转世,蔡琰再生”,却无法得到受教育的机会,最终死于愚昧和巫蛊。

猫庄的宗法主义与巫鬼神秘主义是混杂在一起的。表面看来,巫师赵天国颇具老庄精神,他对猫庄的管理大多数时候是无为而治,重视生命,重视个人感受,但实际上他作为族长,同样具有很强的儒家实用主义精神。子不语怪力乱神,“祭如在,

祭神如神在。”他在魅界和人间随意切换,进出自由。当族长时,他是一个世俗的管理者;进入巫师角色时,他是一个专注于充当人神之间的媒介。不过,他的终极关怀还是人本身,充分表现出人的主体意识,他本质上是一个儒家哲学的实践者。

在对待白水寨匪患这个问题上,他吃透了孟子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精神,允许白水寨这个强敌存在。当彭学清把土匪龙大榜和吴三宝交给他处置时,他还是一贯的态度,放他们走。白水寨龙大榜的存在就是猫庄的忧患,若没有了这个忧患,说不定还是坏事。“毕竟,酉水两岸土匪多如牛毛,哪个山寨不对水美田肥的猫庄觊觎已久?一旦没有二龙山的土匪,猫庄人的神经松弛下来后,反而离亡寨灭族的日子不远了。”^{[2]174}赵天文从城里带来的商业资本思维模式或多或少地影响了赵天国,因此他也不自觉有一种现代资本家的进取精神,也就是被西方称之为浮士德式(faustian)的文化模式。^{[1]42}这种文化模式把冲突看成是存在的基础,认为生命是在不断克服困难的环境中得到成长的;没有困难,没有阻碍,生命就失去了意义。生命正是在这种无尽的循环和递进之中延续的。

但赵天国对自己家族内部的隐患却束手无策。“赵天国已经清晰地感觉到了真正能毁灭猫庄的也只有赵天文。这个已经完全不像猫庄人,而像城里人的他的弟弟,只要回猫庄,每次带给猫庄和族人们的都不是福祉,而是灾难。”^{[2]175}赵天文劣迹斑斑:谋财害命,杀死对他有恩的曾伯,将曾伯的黄金和财产窃为己有;乱伦,强奸同族侄女赵长梅致其怀孕生下私生子;组织民团武装,架空族长赵天国的权力;私占族田,贿赂,赌博,欺诈。赵天文可以说是猫庄的毒瘤,正是因为他的贪欲,把世外桃源猫庄推向了外部世界。当时陈统领(即陈渠珍)进行湘西自治,训练民团。这些民团平时务农练兵,战时上战场打仗。赵天文当上了保董,乡公所把白沙镇西北角七个边远寨子都划归猫庄。赵天文管辖的总人口不上500,猫庄是大庄,有300多口人,于是他把“白沙乡公所猫庄联保办公室”的牌子挂在自家大门口。赵天文招收男青年加入民团,但猫庄青年都躲躲闪闪不愿参加,他只好鼓动猫庄以外的青年参加。外庄来的大都是猎户,他们愿意加入民团的原因是贪图赵天文的那几把空杆子枪,以为可以把枪背回去打猎。这下子猫庄人不干了,赵天国也不干了。外来力量的加入,使猫庄整个制度体

系都受到挑战,因为猫庄是一个相对纯粹的利益共同体,这个性质的共同体本质上是很脆弱的。“小共同体虽然也有人身依附关系与个性压抑问题,但作为稳定的熟人,乃至亲族群体,它的温情纽带,有‘信息对称’与‘多次博弈’基础上和信任机制,因此可以更多地依靠伦理维系。”^{[3]11}猫庄的这种伦理基础被赵天文打破了,他的带有现代性质的管理模式与赵天国的古典模式形成对抗。

赵天国的生命观越来越无法落实。猫庄为了躲避抽丁,常在户籍上玩花样。赵天文重新登记户口时,赵天国说:“你把哪家有三个以上男丁的匀一下,匀到只有一个男丁也没有的人家名下,每家都别超过三个男丁。这样,猫庄的总人口不变,万一有人来查也查不出名堂。”^{[2]178}按照湘西自治军政府的规定,战事吃紧需要兵源的时候是三丁抽一丁,但赵天文却以“秉公上报”“对得起良心”“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大道理抢白赵天国。赵天国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赵天文把猫庄子弟拉出去练兵,以至于后来的抗日、剿匪、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猫庄青年一样都没躲过,伤亡甚至在周边寨子的平均数之上。

以赵天文任保董为界,猫庄可分为前猫庄时期和后猫庄时期。前猫庄时期,基本符合古代桃花源理想,政治清明,生活平静,衣食无忧。钱穆先生认为汉代是轻徭薄赋做得比较好的时代,虽然名义上十五税一,实际上是三十税一。汉文帝时,曾全部免收田租,前后历时11年之久。“因中国疆土广,户籍盛,赋税尽轻,供养一个政府,还是用不完。”^[4]这么好的制度为什么还会引起社会动荡呢?中国封建统治者一直没有解决的问题就是土地所有权的问题。土地私有制是历代封建王朝的基本土地政策。土地自由买卖,地主占有大量的土地,国家赋税越薄,地主越得利。失去土地的农民变成佃农后,给地主缴纳高比例的租金。这样看来,“轻徭薄赋”与“平均地权”结合才算好的制度。猫庄在这两方面都做到了。土地按人头分,优劣搭配,每30年重新调整一次。但在匪患和战乱频仍的年代,“轻徭”是建立在周边村寨“重徭”的基础之上的。薄赋也是很难做到的,况且他们还要额外拿一笔钱来买通各级官员,保证不抽猫庄的壮丁。这一笔成本怎么分摊?所以,到了后猫庄时代,平均地权刚好与新政权重合,抽丁这一项则全部颠覆。时代的大环境之下,猫庄青年根本不用动员,都是主动参

与各种社会大事件的。

在第十二章(小说一共25章),巫师赵天国的神力消失,加上族权被赵天文架空,神权和族权双重失效。虽然赵天国疯颠之后又重新掌管猫庄,但名称变成了保长(保董更名后的名称)。因此,《巫师简史》实际上只有半部巫师史,第十三章之后为可视后猫庄时代。

三 家族史与革命史结构下的后猫庄时代

小说从第十二章断开是有它的内部逻辑的。表面看起来,巫师失去法力,赵天国变成普通人,小说的连贯性似乎从中间折断;实际上是猫庄被解构后,后猫庄时代来临,神权变成多余了。并不是某种神秘力量收走了法力,而是单纯的法力无法驾驭复杂的现实。

于怀岸的家乡在永顺县。假定猫庄是从永顺抽象出来的一个典型村庄,它不同于某一个具体的村庄,但它又具有所有村庄的特征。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永顺县成为社会大动荡的中心。清政府巡防营与同盟会的斗争、革命党革命、国民党建立统治政权等社会大变革,相继在这里发生。湘西的安宁和动荡都与湘西王陈渠珍有关,他也是在永顺被削兵权的。湘鄂川黔四省红色革命根据地中心就建立在永顺塔卧,著名的嘉善抗日阻击战也跟永顺有关系。陈渠珍被何健夺了兵权后,部队由顾家齐带领并开出湘西,编号为128师。浙江嘉兴县志记载的抗战阵亡将士名单,以湖南人为主,最多的是凤凰人,永顺人也不在少数。著名的湘西剿匪,永顺是匪患重灾区,永顺五连洞生擒匪首李兰初是当时轰动湘西的剿匪大事件。《巫师简史》把其中的一些历史事件做为副线处理,通过人物命运的演绎植入小说情节之中,不过重要人物都用了化名,看起来像是虚构的。从小说中看,每当这些历史大事件来临时,猫庄都以消极方式应付。它们铺天盖地而来,风卷残云而走。经过这样一遍遍的折腾,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历史的进和猫庄的退形成矛盾和张力,其间人性的挣扎和撕裂,天生是小说的好材料。与《巫师简史》题材类似的小说大都是以家族为切入点的,像《白鹿原》《尘埃落定》等,这些家族小说都是正面描写,积极介入,视角宏阔,大开大合。《巫师简史》避开了这种套路。猫庄是消极的、逃避的,他们用石头屋把自己包裹起来,用鸦片换来的枪支让自身长满了刺。对赵天国来说,似乎是

怕什么来什么,不管他多么有能耐、多么卖力,家族成员还是以不同的方式损耗着。这里的青年一代家族成员也没能把准时代脉搏,始终是被时代拖着走。赵长春一腔爱国热情,但只能上山落草为寇的方式来抗日。不招人待见的彭武平却误打误撞成了新政权的领导人。制度改变才是颠覆性的,赵天国斗不过历史规律。他有朴素的生命观,但不懂人的自由和觉醒。小说结尾,凶恶的土匪头子龙大榜与和善良的巫师族长赵天国被关在一个号子里,同时枪毙。这种荒谬的情节使得悲剧更悲,由此也可以看出作家在结构上很用心,小说有很强的艺术表现力。

《巫师简史》前半部是巫师史,后半部是革命史。第十三章之后,表现的是国民党、共产党、土匪这三股力量之间的对抗与融合,没有核心人物。革命的风暴之下,巫师的权力被瓦解。猫庄人或赵家家族的人与这三种势力中都有关联。彭武平是一个极具破坏性的人物,在小说中显然不是一个正能量的人物。他出身不明不白,人品不佳,生性凶残,对恩人恩将仇报。他代表的所谓革命力量摧毁了一切,某种程度上是一个恶毒的隐喻。因此,在人物安排上,需要另外一种力量来补充和升华,赵长春似乎可以作为这样的角色。在党派和政治立场上,赵长春和彭武平不是一路人。赵长春身为国军,为人正直,本性善良,迫不得已做过土匪,抗日战争为国捐躯。彭学清是跨越这三股力量的人,他既是军人又是文人。作为军人,他能打硬仗,但手段极其残忍;作为文人,他为礼教所缚,抛弃妻子和一对非亲生的儿女。他意识到新政权的好处,起义投诚,却被冤杀。人性的复杂性在这个人物上展开得很充分。历史小说常常因体裁的限制,人物和事件往往是粗线条的,叙事采取的是俯瞰式的大广角镜头,作者很难腾出手来对人物进行细致入微的刻画。彭学清这个人物其实是可以刻画得更精细一些的。他的复杂性格代表了那个时代的复杂,但他内心难以知晓的深刻矛盾、痛苦和纠结都被简单化处理了,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如果说赵天国与赵天文两个人物的塑造因本性上的泾渭分明,代表了两种力量、两种阵营,那么彭学清恰好是介于二者之间的一类人物。

在小说中,赵天国与赵天文进行过反复的博弈。赵天文赌博,按族规要处罚十鞭。赵天国要赵天文“吃了早饭到祠堂来”,赵天文却以“我是保

董,是政府官员,谁敢给我动刑就是犯法”予以拒绝。赵天国尽管以“进了祠堂只有族人,没有保董,没有团丁”来反驳赵天文,但赵天文的后台老板太大,是国民政府,因此他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一下子送走二三十个年轻人”。赵天文疯颠之后赵天国重新获得权力,又要与共产党的新政权争夺权力。最终,猫庄躲过了最惨烈的土地革命。动土地就是动当权者的老本,无论是哪个朝代,概不例外。中国历史上有记载的最早的土地革命应该是春秋时期的鲁国初税亩。初税亩打破了原有的井田制,履亩而税,损害了鲁国贵族的利益,“《公羊》《穀梁》便群起而喊道:‘非正也’,又说天下‘什一’是‘天下之中正’,‘多乎什一,大桀小桀,寡乎什一,大貉小貉’。”^{[3]27}有时老规矩并不见得是好规矩,但人们不喜欢变革,所以老规矩很难改变。中国共产党的土地革命无疑是中国历史上一次最彻底的土地革命。如果说猫庄的平均地权是基于伦理基础的信任,那么新政权的土地革命则是基于制度上的信任。如何抉择?猫庄人的观念一时也转变不过来。

从小说文本可以看出,猫庄的领导者们都是理想主义者,或者说乌托邦主义者。猫庄人对激进和改革怀有恐惧,他们不当兵,不为匪,不与外界过多地交往,过着自给自足的世外桃源的小日子,避开

党派和政治大环境。但在历史巨轮的碾压下,这种乌托邦理想是肯定会被碾得粉碎的。的确,新的政党的介入,使猫庄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巫师的法器被毁,旧制度被推翻。然而,猫庄彻底消失了吗?小说提了几个潜在的问题:一是在那种动荡的大时代,猫庄人这种对生命的保全是否可能;二是湘西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发生大规模的碰撞,猫庄往远古的农耕社会退守,历史却无情地大踏步前进,人的观念从根基上被摧毁,猫庄人如何重建把握世界的方式和生存的方式;三是人们心目中理想的猫庄还在,然而,全球化已经渗透到世界每个角落,互联网介入到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人们的价值观、生命观都在发生改变,新的猫庄该如何呈现。

参考文献:

- [1] 费孝通. 乡土中国[M].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 [2] 于怀岸. 巫师简史[M].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5.
- [3] 钱 穆.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新校本[M]. 北京:九州出版社,2014.
- [4] 赵骊生. 中国土地制度史[M]. 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27.

责任编辑:黄声波